

中国有句俗语“功夫不负有心人”。刻苦的学习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他在学习期间曾连续两次获英文语说首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士亦以青眼相向。”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我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的学生，“此乃稀贵之荣誉，为常人所难得。”因此，这次耶鲁大学毕业典礼十分热闹，许多当时有名的博士参加了这次盛典，会见了这位才华横溢、温文尔雅的中国学者。

“机会之门”总是向着有真才实学的人敞开着。容闳在美国期间曾不止一次遇到优厚报酬的聘请。一次是孟松学校，校方以资助容闳上大学为条件和聘酬，欲换取容闳为终身传教士。年仅十九岁的容闳虽贫但有其志。他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觅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第19页）于是拒绝了校方的聘请，不为钱财夺报国之志向。另一次是大学毕业后，容闳受到了莫大的劝诱，让他改变终生的打算。他居留美国已久，“具备彻底归化的资格，……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但是容闳却不肯改变他的“终生打算，”决心“为中国谋福利”，（第7页）因此1854年容闳在拿到羊皮纸的美国大学文凭后，毅然动身回国了。

腐败的清政府，没有给容闳以施展才干实现理想的机会。容闳归国后，不得不干与自己所学不相符的工作，先后在广州、上海等地充当译员。在工作期间，他目睹了中国官员的狼狈为奸以图中饱和外国人在中国作威作福的情景，非常愤怒。他曾质问上海关的英籍总税务司：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当中国的税务司？他表示，我是中国人要为中国服务，所以愤然辞去月薪二百两白银的优厚职务，不与同流合污。容闳不为钱财所动的爱国品格，受到人们的称赞：“容某虽贫，傲骨殊棱棱。”

容闳——反对贩卖华工、保护华工在美洲利益的斗士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得到廉价的劳动力，在中国沿海以“招募”华工为名，将大批华工引诱到拉丁美洲。据1874年统计，华工仅在秘鲁一处就达十余万人。这些人实际上是被贩卖到美洲的奴隶。1873年9月秘鲁使臣葛尔西耶来到天津，又要求签订招募华工合同。此时容闳正在天津，直隶总督命容闳参加谈判。秘鲁专使一方面施以小惠企图笼络容闳；另一方面大谈华工在秘鲁如何受优待，并称工资之厚为中国所绝无。此种币重言甘的花言巧语，立即被有民族正义感而又深知真情的容闳驳了回去。他说：“赎卖华工，在澳门为一极寻常之事，予已数见不鲜，……当其被人拐诱……”“既被卖去…受虐待之苦，不胜悲愤。……予今明白告君，君幸毋希望予能助君订此野蛮之条约”。（第9页）秘鲁使臣此次谈判失败后，并不甘心，还想与中国订约。容闳为阻止订约，请求总督批准到秘鲁调查华工生活的实情。容闳经过三个月的调查，深感“秘鲁华工之工场，真一牲畜场，场中种种野蛮之举动，残暴无复人理。”他除了叫华工当场写了控诉词外，还拍照现场实况照片二十四张。容闳的秘鲁之行，使出洋华工受虐待的真相大白了，清政府被迫禁止华工出洋，并在秘鲁派驻了中国使团，与秘鲁签订了华工保护章程。自此之后华工在秘鲁的处境也有所改善，如“无鬻身之事”，“去往自由”，“来去自便”等，（《拉丁美洲丛刊》1981年第4期第97页）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容闳——西学东渐的开拓者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中国人第一次感到落后了。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在这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中，容闳是西学东渐的开拓者。他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突出贡献是：建成中国第一座完善的近代军火工厂——江南制造局；在中国组织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洋赴美留学。

容闳的这两项载入史册的成就，是经历了十多年劳苦奔波，几经挫折才得以实现的。容闳在美国大学学习期间，就痛感中国社会的落后、腐败，立志“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第23页）容闳的志向是很大的，他曾设想过发展中国经济的蓝图，如设立银行，厘订度量衡标准，成立汽船公司发展沿海及内河航运事业，开矿、修铁路，使中国“有无穷厚利，不须患贫”。腐败的清政府，把一切新知识、新技术都当作“奇技淫巧”加以排斥，根本不理睬容闳的这些主张。

太平军起义对清朝统治者的打击和洋枪洋炮在镇压革命中的“作用”，使反动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认识到：“师夷智以造炮造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他们挂起“自强”、“求实”的招牌，兴办洋务，到处寻求对西学略知一二的人。容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朋友介绍，于1863年结识了曾国藩，成为曾国藩大营中办理洋务的幕僚。

曾国藩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倡议创办军事工业的人。他最初把办洋务、造洋炮看得很容易，以为找几个工匠就能仿造出来。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了军械所，仿照洋船造成一只轮船。但小轮船“形模粗具”，“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引自牟安世《洋务运动》第63页），宣告失败。容闳的到来，给中国近代军火工业的创建带来了新的起色。1863年9月容闳根据他在美国考察的工业发展的经验，向曾国藩陈述了关于如何发展工业的建议。他主张今日的中国要建设工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工厂为主，即先建机器制造厂，然后再设种种分厂，生产各种车床、锥锉，有了这些机器，即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它种种机械之物。“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廉价多矣。”（第23页）容闳的建议正中曾国藩的下怀，曾国藩立即授容闳五品军功，委任容闳带六万八千两白银去美国购买机器。1865年春容闳采办机器事宜完成后回到上海，并将李鸿章在上海购买的一家洋铁厂的设备合在一起，在上海高昌庙建立中国第一座完善的近代军火工厂——江南制造局，内设有汽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木工厂和铸铜铁厂。1868年制造出我国第一只轮船“惠吉号”，此船长十八丈五尺，时速上水行七十多里，下水行一百二十余里。容闳因办此厂出力最大，清政府特授五品候补同知，月薪二百五十金。

容闳生平最大的愿望和乐趣是办教育、开民智、育人才，想培养出自己的工程师、技术人员，以摆脱对洋人的依赖。容闳归国五六年，多次扣敲衙门府的大门，希望他们开点门，让新鲜的空气进入窒息了的教育事业之中去，以挽救中国的教育。然而门仍旧不开，致使容闳有些心灰意懒。后来江南制造局的兴办，给容闳又带来了希望，1868年他通过老友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政府提出兴办教育的主张，希望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其具体办法是：第一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试行，将他们分成四批，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十五年，留学经费从上海海关税中提成解决。但这时顽固势力仍很强，对此建议不予理睬。1870年容闳趁在天津办理教案之际，再次向曾国藩提出派留学生问题。曾

藩在长期办理洋务的过程中已体会到培养翻译、了解西方科技的重要性。他说，“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录，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乎用器与制造之所然”。（《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33卷第7页）为此曾国藩、李鸿章“联衔”致函总理衙门。清政府从学西方制造“坚船利炮”的技术用来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批准了容闳的计划。

容闳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在上海、广东、香港等地挑选了三十名十二岁到十五岁的幼童，于1872年夏在容闳、陈兰彬的带领下，前往美国学习。从此开始了我国历史上官办留学事业的历史。从1872年开始到1875年秋，每年陆续派出留学生三十名，一共派出一百二十名到美国。这一百二十名，最初是通过容闳的关系，全部住在美国人的家里。为使留学事业长久下去，容闳在哈特福德城克林街，建造了一所三层楼的房屋，作为留学生事务所，把学生集中起来学习和住宿。

幼童留学教育并没有按着容闳的意愿长存下去。幼童在美国学习期间，不仅增长了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使资产阶级的民主、伦理道德观，也渗入了他们的灵魂。他们开始挣脱封建主义的枷锁，象美国学生一样游戏、运动，穿西装，进教堂，与教师讨论问题……。这些从顽固守旧派看来是有伤风化，大逆不道的。因此清政府多次派人检查学生言行，令容闳严加管教。但容闳多为学生“辩护”，这就引起顽固派的怨恨和反对，先是把容闳调离当驻美公使，后又多次指责容闳，终于在1881年清政府以“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洋务运动》二：《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诉等奏》第166页）为名，关闭了留学事务所，将留学生一律调回。

容闳——清王朝的叛逆、“共和”的先驱

1900年8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镇压自立军起义后，到处捉拿唐才常的同党，其中的首犯就是容闳。此时容闳已72岁。这位为振兴中华，一心从事传播西学者何以成为清王朝的叛逆？其实容闳叛逆清王朝绝不是偶然的。早在1855年刚从美国回到广州，就遇上了叶名琛对广州人民的大屠杀，一夏天所杀计七万五千人。他目睹杀人现场“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赭色。余血盈科而，汇为污池”。（第30—21页）一个满怀着解救人民于“痛苦与压制”而归的热血青年，看到此种情景，“神志懊丧，心中烦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予既表同情于太平军，乃欲起而为之响应。”（第30—31页）但这时容闳的反抗情绪，还只是从同情人民出发，对清统治者的本质还没有认识，所以把这一切屠杀的罪恶看成是叶名琛一人所为，对清政府还寄予希望。后来，在历经坎坷，屡遭挫折的亲身体验之后，他才逐渐清醒了过来。

先是留学生计划的失败，使他对用教育救国失去了信心，“顿觉心灰，无复生趣。”但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使容闳“爱国心油然而生”，又开始寄希望于清政府，盼由此振作，改弦易辙，以富国强兵。他不顾自己年过花甲，又不远万里回国，提出向英国借款一千五百万元，购铁甲船三四艘，雇佣外兵五千人，抄袭日本后路，与日本决一死战。他还提出兴办国家银行，整顿财政；修筑天津到镇江的铁路……。这一切振兴计划，由于帝国主义的阻挠和事先没有贿赂清政府的要员，因而一个都没有实现。这次失败给容闳很大打击，“予救

助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第113页）同时，也使容闳对清政府有了新的认识：“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是贪官污吏，因此“中国根本上之改革”，已为“不容稍缓之事”。（第120页）

甲午战争后的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于1898年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容闳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改良运动也不为清朝政府所允许，惨遭镇压，谭嗣同等七人被杀，康梁被迫逃往国外，容闳也从北京逃到上海。挫折和失败教育了容闳，使他觉醒起来，“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转引自《中国近代爱国者的故事》第208页）此时中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局面，容闳自此完全抛弃了改良主张，投入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洪流中，为民主共和而斗争。

容闳在维新变法失败逃到上海后，参加了自立军起义，他被推为强国会会长，成为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起义失败后，容闳于1900年8月逃往日本，在日本门司会晤了孙中山先生。这次会见给容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孙中山先生的事业极为称颂，称孙中山“宽广诚明存大志，予勛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他日见面，汝当助其成功”。（刘成禺《世载堂杂记》第114—115页）

1901年——1902年间，容闳移居香港，参予筹划广州起义。为使起义得到外国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于1902年5月离开香港，亲自到旧金山等地寻求外援。起义计划泄露，即遭镇压而失败，容闳与革命党失去了联系。但容闳为革命奔走的活动并没有中断，1909年他争取了美国的军事专家荷马李及财界人士布司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1910年初孙中山先生到达美国洛杉矶，在容闳的介绍下与荷马李和布司多次会面商谈。容闳在此期间也与孙中山先生面晤及书信往来。通过会谈，他们制订了起义计划，“决定暂时停止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那些未成熟的起义，以积蓄人力物力发动一次规模大的起义，并以孙中山的名义，委任布司为中国同盟会驻国外全权财务代办，向纽约财团贷款，筹组临时政府。”（参见《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袁鸿林“关于容闳的晚年”一文）这个计划对辛亥革命起了重要作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终于被推翻了。

革命胜利给老人带来了极大的欢乐。这时容闳虽已重病卧床，但他仍用颤抖的手，满怀深情地向革命者致函，称赞他们说：你们代表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那些近三百年来深受压制的人们——高呼着共和国，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去赢得自由和独立。

孙中山先生给容闳很高的评价，称他为“谋复清满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素仰盛名，播震环宇，加才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的“老同志”，（《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44页）邀他归国工作，并随信寄去孙中山先生照片一张，以示恳切邀请。可惜这位老人已病重不省人事。不久，容闳于1912年4月21日与世长辞，享年84岁。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留美毕业生，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批人物中”享有盛名、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的爱国者。他为振兴中华呕心沥血，真是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容闳为振兴中华所走过的道路告诉人们，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旧中国，任何良好的愿望都不可能实现。今天我们的祖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为一切有志振兴中华的人们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祖国在召唤，愿一切海内外赤子都来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吧！

〔责任编辑 李长城〕